

基于社会团结的包容性社会

——关于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包晓霞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兰州 730070)

【摘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建设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是当前中国社会管理改革的核心议题。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诠释了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的目标选择,并系统分析了改革所面临的挑战。社会形态学认为,社会是一个物理心理过程,其物理部分是由人口和社会资源分配形成的社会结构,心理部分则是社会联结的纽带。社会管理就是社会管理者通过调整社会资源的供应和分配,操控人口的流动和社会成员的心态,增强社会的联结纽带,不断塑造变化着的社会形态的过程,社会学对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系统的理论知识和分析工具,国外关于社会管理的战略及其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综合分析表明,当前中国迫切需要在加强社会团结的基础上发展社会的包容性。

【关键词】社会管理 社会团结 社会排斥 社会包容性 社会形态学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1)05-0068-11

中国政府把社会管理作为重要的政治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始于“十一五”初期。从中央政府的社会管理战略部署和相关的政策解读文献看,至“十一五”末期,这一社会管理的战略思路,一直是以“三部门”说为理论支撑的。所谓“三部门”说,即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部门在社会管理中的分工或职能作用,作为论述社会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强调“三部门”之间的合理分工和职能强化,谓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社会管理的“三部门”说,实质上强调的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及其管理职能的发挥,或者说是社会管理方面的分工,并没有解决社会管理的目标和任务、对象和技术等核心问题。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诠释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的目标选择,并系统分析改革所面临的挑战。

一、社会的本质

社会管理的提法中涉及两个关键词:社会和管理。如何解读这两个关键词,是研究和制定社会管理战略和规划的关键。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看,社会是通过相互依赖

和劳动分工而聚集在一起的高度整合的生物群体。社会形态学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物理心理过程,其物理部分是由人口和土地所构成的,是可以看见、可被描述、具有数量、空间的部分;其心理部分是由思想、观念、情感构成的,是看不见但感受得到的部分,是社会联结的纽带。由此,以人口与土地的关系(基于分工和分配)为基础,形成了城乡、族群、民族、性别、阶层、年龄等社会群体,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和机构。现实社会运行当中,这两部分是不可分割的。国家是社会的一种形式,国家就是一种社会大系统,内部包含许多亚系统或子系统。国家这个层次上的社会系统仍然是相对的,与外部社会系统之间通过信息、交通等联系越来越密切,比如全球化,就是这种联系的表现形式之一。

许多社会问题都源于社会的物理性,即人口与土地的关系,如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学校、医院、养老机构、住房、就业岗位、道路等等的供应状况,取决于人口的数量和结构,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都是一种硬约束的社会物理问题,是社会形态在结构方面的缺陷和不健康状态。这些

收稿日期:2011-09-08

作者简介:包晓霞,女,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甘肃省人口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问题对于社会有机体的后果,则经由社会的心理性表现出来,形成社会心态,即社会成员的感受、态度和行为,推拉着人口的运动,决定着社会动态的平衡与否以及社会联结纽带的强弱。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其分配社会资源的政策,既基于经济规模和水平,即“蛋糕”的质量和大小,也取决于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分配的结果,便形成了特定时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社会管理者通过调整社会资源的供应和分配,操控人口的流动和社会成员的心态,不断塑造变化着的社会形态。这就是社会学家眼中的社会管理的本质和基本规律。

从结构上看,社会是由于人口的分工所形成的。所有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都是建立在人口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只有在人口为其准备了充分条件的土地上才能够产生和形成。“社会分工取决于人类群体的延伸和人口密度的增加。这两个因素是实现以下目标所必需的:为了在一个广阔又集中的群体里显现和发展不同的才能和需求;为了在一个群体间联系更紧密、接触更频繁的社会里才能和需求相互作用,相互刺激;为了使一种不断精确化的适应建立在产品技术(越来越专业)和消费者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之间。但是,如果社会群体首先在数量和密度上获得发展,这是因为人口通过自身的运动而增加,是独立于经济动机之外的原因。”^[1]

从动力和功能看,社会联结或社会团结的动力及其运动趋势,主要是由社会心态决定的,即社会人口对自己生活状态的主观感受和评价,以及基于这种评价所产生的情感和情绪状态。社会人口依然是这种情感或情绪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绝大多数人口的情感或情绪状态代表社会心态。社会心态取决于人口对自己生活质量的判断,而这种判断主要是依据社会比较的结果。当社会分化非常明显的时候,人口流动的力量就形成了,人口流动的力量和方向,取决于社会比较的结果。当比较的结果差异较为明显时,人口倾向于向更好地区或更高的地位或层次流动,这就使得社会充满了活力。而人口的流动过于频繁或规模过大,就会造成对社会资源的不必要的浪费,以及对人力资源的消耗。同时,社会比较的结果差异过大,社会心态就会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就像大海的波涛一样,既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也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其建设和破坏的力量同样强大。因此,人口的分布形态决定社会心态,社会心态又决定人口的运动趋势。不论是在哪一个层次上,社会的本质和特征都是由人口的社会分布形态和社会心态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管理的社会功能就是塑造健康的人口分布形态,通过建设和运行社会制度,避免借助于战争或自然灾害的破坏力量,有计

划、有目标、合理地引导人口流动和布局,既保持适度的社会活力,又能够相对稳定,让尽可能多的人能够实现“安居乐业”的愿望,让尽可能少的人处于频繁流动的状态。这就是一个功能正常的或者健康的社会。

这表明,社会学的原理要求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满足结构特征、动力特征和功能特征。这样的社会是社会与个人或社会与群体之间良好关系和良性互动,最大程度地满足了个体或群体的多样性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地满足了社会的团结性和有序性。这样的社会才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家园。

二、社会管理的内涵

社会管理的目的是组织社会生活,实现社会良性有序运行。早在18世纪,社会学家斯宾塞就明确提出了社会管理的必要性,他认为,在复杂的社会中,各部分之间相互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社会的脆弱性也越来越大,这就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控制并协调各部分行动的“管理系统”。西梅尔从社会的人口规模增长和分工的角度论述了建立正式的社会管理制度重要性,他认为,一旦群体的规模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必须通过正式的管理而使相互作用得到协调。为了控制由于人数增加而日益复杂的关系,群体必须创造特殊的制度把个人之间的相互交往纳入轨道。没有这些制度,一个大群体是不能运行并发挥作用的。

社会管理要实现两个层次上的社会功能:(1)针对社会本体,体现为根据社会内部结构变化的要求,协调内部关系,使其达到均衡发展;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要求,使其在与邻近社会的互动中能够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利益的功能;(2)针对社会成员个人,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这意味着,社会管理的另一个功能是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提高个人福利水平。社会管理的这两层目标之间具有相互的功能关系,这种功能关系客观上是由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所决定的。个体为了获得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而加入社会,并通过表现出持续的亲社会行为,来维系这种功能关系。正是个体的这种选择才使社会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发挥着满足个体社会归属感和社会服务的功能,而个体社会身份的确定和社会功能的发挥,构成社会的基本框架和联结纽带。“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的缺失,会使一个人从自己的同胞社会中被抛弃出来,成为‘无根的’个人或弃儿,而此人是看不到社会的。”^{[2](P10)}因此,社会管理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本质,是管理者依据特定社会对人的本性和人的生存价值的实现所持有的信念,赋予个人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的权利,将个人适度地包容到社会中。关于人的本性和生存价值的信念,既是功能正常的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管理的基础。离开

了这个基础,个人就成了无本之木,社会也就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

社会学家在研究具体的社会时,把社会在理论上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1)社会与自然的分界,成为宏观社会的基本标志。在这一层次,人类社会是由人口的不同组织所构成的物质实体,人口是社会的物质基础,这决定了自然是人类社会运行不可缺少的物质环境,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是处理人口与自然的关系、规范人口的组结秩序的制度设计。由此,社会与自然,人口形态与资源分布,文化与政治、经济制度形态,共同组成了一个有机的社会形态学体系,体系内部的各要素之间为结构相依、功能互补的关系,各要素本身相对于其他要素,又相对独立地存在。如此,体现了社会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相对于社会整体而言,社会各要素成为社会子系统,社会整体即是社会系统。(2)在中观层次上,社会的界限比较模糊,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是指与政府和市场相对的领域,即民间或基层、草根等;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是指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对的领域。这两种观点在诠释社会现实时,有较大的差异。前者更倾向于从管理学的角度去理解社会,后者则更倾向于从工程学的角度理解社会。政治体制、文化内涵和社会制度建构,是这一层次上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策略。(3)在微观层次上,社会基本上指初级群体,包括族群、共同体、社区等范畴。库利把初级群体称为“生活之源”,它能够满足人们对亲密关系和社会归属的需要。在现实的社会运行过程中,这三个层次之间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互动关系也比较复杂,在宏观层次上,人口的存在状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中观的层次上,政治体制更具有优势地位;在微观层次上,文化的影响力更突出。社会管理应当包括全部三个层次上的“社会”概念和现象,依据整体的、联系的和系统的原则,调节和控制社会。科学的社会管理要求运用社会学的原理去管理社会,既要遵循社会自身的运行规律,也要立足于社会的客观存在,承认社会有其自身运行规律的同时,承认社会的结构特点和功能差异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社会管理者的角色认定,决定或影响社会管理的模式。在国家社会的层面上,政府是正式的社会管理者。法制型政府的社会管理模式的特点是将社会成员视作法制框架内的公民;服务型政府的社会管理模式的特点是将社会成员视为顾客;自由市场政府的社会管理模式的特点是将社会成员视作理性人或利益载体。而社会构建型政府的社会管理模式,不同于前三者,是将人口视作社会成员,通过秩序和制度建设,将人口联结为一个社会共同体,是以社会的两大物质基础——人口与

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调节为基础,以人口为根本,以社会共同体的形成为目标,运用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资源塑造理想社会形态的过程。而这样的社会管理模式,需要通过制定并实施社会管理的战略和规划来实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框架设计,不仅要吸收核心理论和技术及其包含于其中的知识体系,还要基于社会现实,回答为什么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问题。答案只能从社会现实中寻找,并从思想上明确,是变迁了的社会现实要求进行社会体制改革,要求采用新的社会管理体制,来解决新的社会发展问题。

归纳起来,社会管理就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通过建立并运行社会制度、制定并实施社会政策,调动社会资源,赋予社会成员身份和功能,操控社会人口的分布和流动,塑造既充满活力又团结有序的社会的过程。

三、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理论基础

社会的变迁也罢,再造也罢,都是有规律可循的,需要用科学的态度去面对,去寻求解决途径。这就需要运用社会组织原理和运行原理,诊断和认识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途径。社会科学体系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技术。其中,社会学对于社会的研究,集中于社会组织和运行的原理,为以社会为对象的管理改进提供了科学依据和认识工具。奥古斯特·孔德建议将社会学分为社会解剖学和社会心理学,这一观点的基本内涵是:社会的形成是由构造原理和心理原理所决定的。社会的结构是由社会人口所构造的,社会的联结是由社会心理所形成的。由此,社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如人际关系、群际关系和组织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是由人口的分工、供需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学学科内部形成了许多用于解释这些关系的理论和概念,比如: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工程、社区组结原理或社会团结理论等等;此外,政治学和管理学也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管理的理论和技术。由此可见,社会管理至少涉及到三个方面的核心理论和技术,即社会学、政治学和管理学。进行跨学科研究,对社会运行现实进行诊断,提出符合社会运行原理和规律的对策建议,包括:通过完善社会制度建构,政策设计以及制度和政策运行方案等管理手段、重视运用社会学概念和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采取社会学的方法论和视角,对社会现实进行研究等等,都是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基本策略。

(一)社会团结理论与社会联结纽带

社会团结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的整合原理。社会学家涂尔干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团结”这一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一套关于社会团结的理论。在这一理论中,社会团结是指把个体

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纽带,其含义与“社会内聚力”、“社会整合”大体相同,产生社会团结的基础是社会成员的集体意识和共同的价值观、道德规范。由于产生社会团结的基础不同,社会团结可以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前者是指通过强烈的集体意识将同质性的个体结合在一起的社会联结纽带,原始社会和传统农村社区的社会团结就是这种团结的典型表现;后者是指一种建立在社会成员异质性和相互依赖基础上的社会联结纽带,有机团结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团结类型,现代城市社区的团结类型是这种社会团结的典型表现。现代社会由于个性的发展,成员的异质性增强,削弱了作为机械性团结基础的集体意识,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机械团结的纽带,使社会面临解组的危险;但另一方面,由于分工所产生的新的伦理规范——职业道德的作用,又形成了成员之间同质性和集体意识的基础,替代了传统社会中成员之间的同质性和集体意识,促成了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类型的转变。但反常性的分工如一个社会的分工增长速度过快、强制性分工、过分强调技术的非人化的分工等,都会破坏正常的社会分工所能产生的这种有利于有机团结的基础,因此,为了预防和治疗现代社会的反常分工对有机团结的破坏,就必须全面加强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建设。与涂尔干不同,滕尼斯认为,社会团结不能仅仅依靠社会成员个体对团结的依赖或需要,同时还必须依赖于一种特殊的社会纽带。传统社会的团结是一种有机的团结,而现代社会的团结更多地通过契约和交换关系确立,因而是一种机械的团结,随着地域流动的增强、产业结构的分化、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以及无限制的经济竞争,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甚至陷入敌对状态,因此,重建社区团结是现代社会的所能选择的出路。^[3]

(二)社会融合理论与多元化社会

社会融合理论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其核心内容是族群融合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融合的族群模式有两种:(1)同化模式,即不同族群自愿朝一个共同的主流文化融合,而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逐步趋向一体化;(2)多元化模式,即不同族群在文化上保持平等,但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应整合在一个体系内,实现多元共存。族群融合的多元化模式是通过强调族群文化的多元共存来实现在一个多族群社会的团结和融合。与同化模式一样,族群融合的多元化也有几个维度,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和结构维度。文化多元化意味着在较大社会的文化体系框架内保持多个不同的文化体系。这一维度的多元化被称为多元文化主义。结构多元化不仅仅意味着在文化方面存在

不同,而且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分割的族群社区,族群成员的大量社会生活在社区进行。社会认同理论解释个体与社会、个体与群体和个体与他人的关系,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个体如何建立社会联结,以及整个社会应如何维护团结和凝聚力。社会认同的核心概念是自我认同,主张自我不仅是“社会我”,而且是“镜中我”,自我是社会的一种心理反映,是一种多维的和组织化的结构,需要社会或群体来建构,而且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自我认同并不是自动的心理过程,而是源于个体依据个人经历的反思性建构;自我认同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会随着现实的变化和自我的反思性活动而发生变化。个体通过自我认同来明确身份和社会功能,为个体融入社会提供心理基础。个性多样化就是社会成员个体社会认同的结果,也是社会包容性增长的结果。

(三)社会认知偏见与社会排斥

偏见是一种不正确的认识。社会认知偏见基于主体的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源于社会的信息传播和主体对群体差异的社会评价和判断。因此,偏见产生喜好、厌恶和不安全感,这种情绪特征又引起信任或不信任、顺从或追逐、歧视或排斥,反过来,这些行为又进一步增强偏见。偏见的性质将决定主体在这种两极性的态度和行为之间的选择。社会认知偏见是社会排斥发生的根本原因。社会排斥是一种具有多维度的状态,这种状态包括:社会分裂或断裂、不完全参与、处于所生活于其中的主流社会的边缘等三个关键的维度,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多方面,包括贫困、半失业、社会整合以及公民身份之间的种种关系。社会排斥根据发生机理的不同,可以分为制度性排斥和主体选择性排斥两种。制度性排斥是指被排斥者被排除于正式的制度之外,这种排斥与对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的歧视和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或文化的偏见有关。对于社会本体来讲,这种社会排斥的后果,主要是社会的分隔与裂隙。主体选择性排斥是指排斥者拒绝参与社会生活,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疏离社会的态度和行动,如不参与主流社会的活动、拒绝接受社会的正式规范和由社会管理者提供的服务等。被排斥的对象既不是个人,也不是群体,而是代表主流社会的正式制度和规范,因此,是一种排斥社会的行为。社会排斥行为是主体参与社会的一种态度,主体通过社会排斥行为,与社会形成隔离或断裂,这种行为与亲社会行为恰恰相反。在一个特定社会中,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采取社会排斥行为来处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时,就会传播出一种冷漠与孤寂的社会情绪,社会就会逐步走向原子化。

(四)道德恐慌与信任危机

道德恐慌是与信息传播有关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状态。信息传播是社会联结、沟通的重要渠道,不恰当的信息传播,无论是内容方面的还是形式方面的,都会诱发一些特殊的社会心态。道德恐慌就是由不恰当的信息传播引起的一种负面的社会情绪,它破坏社会的信任机制,导致信任危机和过分的防御行为,极易产生封闭的“小圈子”和社会隔离,当这种情绪状态持续一定时间并且影响达到一定规模时,形成一种叫做“社会戾气”的社会心态,影响社会的稳定。当一大批人对某些他认为能威胁人类道德的行为感到过分担心甚至害怕时,道德恐慌就发生了。这时,人们把威胁设想得非常大,而且会对那些他们认为应当负责的人产生敌意^{[4](P618)},而且,这种态度和情绪一旦产生,就会顺势蔓延和扩散,直到影响到大多数人的正常生活。因此,对社会的危害是极大的。道德恐慌的产生和蔓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心理过程。这种过程往往围绕一种危险感产生,由谣言引起,道德恐慌也因为不确定性和忧虑而滋生。社会生活的深层变化,极易引起大量的忧虑,这些忧虑都可能成为引发道德恐慌的根源,将大众传媒中的某些不谋而合的信息进一步放大、扩散。当社会大众怀有一种危险感,或者心中常忧虑时,就会高度关注这些引起危险感或忧虑的信息,并且不计较这些信息的真假和虚实,倾向于在心里放大这些信息,并通过诉说进行个体间的传播。不确定性越大、忧虑越多、危险感越强,产生道德恐慌的可能性越大。因此,谣言、大众传播都是引起道德恐慌的主要诱因,今天的道德恐慌大都是由大众传媒引起的,特别是一些新的大众传媒形式,如网络、手机短信,一些过分渲染社会阴暗面的影视剧等。

(五)社会的“麦当劳”化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注意到了社会生活组织过程的合理性,在带给人们巨大的福利的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他注意到,当社会制度越来越合理性的同时,却越来越缺乏人性,越来越多的社会部门日益变得合理化,最终,社会将变成一张充满理性机构的密不通风的网,一旦那些合理系统不断增生到这样的程度,我们将面对一个合理的铁笼:无法逃离,没有出口。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理茨尔(1999)的社会批评理论将这种合理性概括为“社会的麦当劳化”,其本质特征是:效率不断提高、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以至于几乎所有的社会机构(如教育、体育、政治和宗教)都在采纳这种运作原则,当今世界以麦当劳化为代表的现代合理化进程的发展趋势,可能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性,使各种机构和过程单一化和机械化,对于过程的控制反过来控制了人,这种趋势

走向极端,将整个社会编织成为一张无所不包的大网,冷酷地控制每个人。^{[5](P16-20)}这就是当今社会理性化地组织的结果。现代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和规范越来越标准化,这种标准化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某些社会群体或社会成员个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阻碍了他们对正式的标准化的社会生活的完全参与,使他们在正式的制度和政策框架中被边缘化,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的断裂或分裂,是一种剥离了人性的、缺少文化内涵和包容性的社会。一方面,使得社会变得更加理性化,另一方面,使社会变成了一个没有批判的社会、单向度的社会,这些,都是一种不符合人性的特征,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失去情趣、浪漫和理想,个体越来越本体化(肉体化、生物化)。用梁实秋的说法,人生有三种境界:自然的、人性的、宗教的,如果把这三种境界放在同一个尺度上,则“社会的麦当劳化”使人生的境界越来越向左移动。人性的境界,是自然的和宗教的两种境界“碰撞”的结果,寒冷与孤独就是这种境界的真实感受。

(六)政府的社会管理功能

“人类作为社会和政治的存在,必须要有功能正常的社会,正如人类作为生物存在,必须要有空气以供呼吸。不过,人类不得不需要一个社会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个社会事实上存在着。没有人会把船只失事时一群无组织、惊慌失措四处奔跑的人叫做一个‘社会’。那儿尽管有一群人,但并不存在社会。事实上,这种恐慌的直接原因便在于社会的崩溃;而克服这种恐慌的惟一途径,是要用社会价值观、社会纪律、社会权利和社会组织来重建一个社会。”^{[6](P7)}政府是国家管理者,而国家的存在,从本质的意义上看,是一个社会良性运行的需要。人的社会需要从家庭开始,到社区、亚文化族群,到社会组织、正式的社会制度,这些不仅给人一种合法的身份,也规定一个人的地位、归属,标志着一个人的社会存在。这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这个意义上看,国家首要的存在形式和本质特征就是社会。政府是通过一定的程序产生的合法的社会管理者。中央政府从宏观的层次管理社会,使整个国家的人口基于劳动分工而形成各种职业和阶层,而有限空间中的土地,则以其与人口的关系和生产方式中的利用价值而划分成不同的功能区域。中央政府的责任,就是通过培育社会组织和建构社会制度,把全国的人口有机地联结为一个社会生活的共同体,而国家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名称或形式。这个共同体,从形态上看,主要是人口的不同分布和迁移趋势或动向,它将决定共同体的稳定程度和流动倾向。当共同体中的绝大多数人口处于定居状态,少部分人处于适度流动状态的时候,就可以认为,这个社会既保持了适度的活力,又

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且功能正常。当绝大多数人口处于流动状态,且频繁流动,则说明社会不够安定,社会的总体功能出现了问题,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健康的、功能正常的社会。

上述社会学理论和概念,集中地讨论了社会组结和运行的基本原理与本质特征,对社会变迁引起的具有“现代性”和普遍性的社会问题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界定,提供了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理解和诠释当前社会现实的理论背景和分析工具,使我们能够超越置身其中的现实羁绊,透过社会的现象窥见其本质。因此,是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重要理论基础。

四、国外的社会管理战略及其实践

(一)从“社会排斥”到“社会包容”

1974年,法国学者勒努瓦提出了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概念。此后,以社会关系的解体为核心特征的“社会排斥”概念迅速替代“社会底层”或“下层阶级”、“社会弱势群体”等概念,并受到世界各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大量“被排斥”和“排斥”现象在世界各地、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被观察和描述,并分离出来。这些研究表明,造成社会排斥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的正式规范的标准化、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包容性不足,将一些群体或个人排除在制度和规范之外。其中,一个未被社会的正式制度和规范所包容的重要方面是非主流文化及其群体,以及缺少话语权的群体等社会弱势群体,社会排斥造成了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地位、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利地位,导致他们的贫困。以社会排斥现象为主要特征的社会问题,困扰着世界各国的社会管理,而社会排斥的核心特征是社会关系解体,造成社会排斥的根源是对某些群体或个人的权利的剥夺和机会的不平等。这种现象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被发现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无论富裕或贫穷,无论发达或落后,无论多样性或单一性社会结构中,且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而且,与贫困相联,也与“身份”、“土著”、“阅读障碍”、“文化根源”、“语言”、“种姓”^[7]等概念相联系。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排斥概念被作为一种测量和分析工具,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国政府的社会管理战略制定、公共政策制定、甚至国际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并且引领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政策和社会管理模式:通过制定和实施针对社会文化和需求多样性的社会政策,发展社会的包容性。近些年来,发展社会的包容性逐步成为各国社会管理的首要目标。

社会包容性是与社会排斥相反的概念,在当今国际上,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最近几十年来,这一概念的流行,主要是由于社会排斥方面的研究和重视。在新的世界价值标准和观念中,社会

分裂或解体,成为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类发展问题,在各个国度都程度不同的存在,所以,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而包容性则是一个极具普适性的努力方向。包容性是为了加强社会的团结,增强社会成员的共同体感,满足社会成员的社会归属需要,使人人过上质量更高的社会生活。这是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努力方向,对于社会来讲,需要通过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高其包容性;对于群体或个人来讲,需要放弃部分私利,多一些亲社会的态度和利他行为,才能融入更大的社会生活中去。离开群体或个人的让利,离开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个人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社会义务的行为,制度和政策规范本身的包容性只能是一种“乌托邦”。

为了实现减轻或消除社会排斥,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机构,都纷纷成立了相关的机构和组织,从事与反社会排斥相关的研究和战略制定。欧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政府的行为很有代表性。在这些国家和组织的战略和研究成果、所发表的测量结果中,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问题带有普遍性,虽然程度和侧重面不同,但这样的社会关系的确严重地影响了这些地区或国家的居民的社会生活质量,成为国家社会管理战略的重中之重。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重视社会管理不只是中国当前特有的现象,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在致力于改善人口生活质量、建设功能健全的社会、提高人口社会生活质量的战略选择。研究和了解这些动态,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当前中国政府重视社会管理成效,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二)澳大利亚政府的社会包容战略计划

澳大利亚政府成立了澳大利亚的社会包容委员会,专门致力于减少社会排斥的发生率。该委员会组织不同领域的专家,研究制定国家反社会排斥战略和规划,并于2010年1月发表了题为《社会包容:澳大利亚如何发展》的报告,提出了实施国家的社会包容性的测量框架和战略规划。内容包括:建立监测制度,及时收集进展信息,并向公众报告准确的进展情况;实行定期评价报告制度,及时总结经验,分析新的挑战;实行问责制,并鼓励公开辩论,以便强化地方政府的意识;建立成功经验共享机制,及时分享成功的经验;增加对澳大利亚的社会包容的程度和性质的认识,建设一个更有力的证据基础。该报告还提出了一个比较宽泛的框架指标,用于测量在澳大利亚的社会包容性的变化情况,这一指标体系涵盖以下多个维度:材料和经济、健康和残疾、教育和技能、社会资源、社区和机构的资源、住房和人身安全。^[8]

(三)欧盟的社会包容议程

1988年,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首次在它的文件中运用了“社会排斥”一词。1989年,欧洲社会宪章(European Social Charter)的序言中指出:“团结精神对于反社会排斥是十分重要的。”^[9]同年,欧洲部长会议做了关于“反社会排斥”的决议,要求成员国政府通过改进其社会政策,对社会排斥进行有效干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欧洲委员会还设立并实施以推进社会与经济整合为目标的反贫困项目。这一项目把欧盟反社会排斥的理念传播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政策研究者的重视,反社会排斥逐渐成为各国社会管理的核心目标。进入21世纪后,联盟对社会排斥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2000年3月,欧洲理事会(the European Council)在里斯本举行的欧洲论坛上,促进社会融合(social inclusion)和社会整合(social cohesion)成为欧洲联盟核心战略目标。同年11月的尼斯会议上,则要求每个成员国签署两年的国家促进社会融合实施计划,其中包括能够衡量这一计划进展的专门指标和监督机制。尼斯会议提出的反社会排斥目标包括:促进就业参与,提高获得资源、权利、商品和服务的能力;预防社会排斥的风险;帮助弱势群体;调动其他相关团体共同克服社会排斥。此外,欧盟委员会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减少或达到消除欧盟成员国中的社会排斥现象,增强社会包容性。

(四)英国政府的反社会排斥计划

在欧盟理事会的促进下,1997年,英国工党上台执政后,开始重视社会排斥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强政府的反社会排斥成效,包括:(1)界定官方的社会排斥概念,英国国际发展部在其2005年的报告中指出:“社会排斥描述了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群体系统处于不利地位。社会排斥建立在对民族、种族、宗教、性取向、种姓、血统、性别、年龄、残疾、艾滋病毒状况、移民身份或他们身在何处等社会标识或身份歧视的基础上。歧视发生在公共机构,如法律制度,教育和卫生服务,以及社会机构人们像家庭被排除在外,执行机构和行为,反映和再现当时的社会态度和价值观,尤其是那些强大的社会团体”。英国首相布莱尔认为,社会排斥“广泛存在于那些缺乏手段、物质支持和其他条件参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人群中”^[10]。(2)在内阁中成立了社会排斥办公室(the Social Exclusion Unit),以协调各个部门反社会排斥的行动,负责向首相报告如何解决犯罪、毒品、失业、社区分裂和不良教育等方面的问题,以解决社会排斥问题,促进社会融合。(3)在伦敦经济学院设立了社会排斥(案例)分析中心,专门进行社会排斥方面的调查与研究。工作。(4)制定以促进社会融合、增强社会包容性为目标的政府

反社会排斥行动计划,采取了五个方面的反社会排斥的措施,即:为能工作的人提供工作机会、为不能工作的人提供保障、强调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促进公共服务的一体化。(5)建立并运行社会包容性测量和报告制度,制定用于测量政府部门及地方政府实施社会包容性战略成效的指标体系,重点监测和分析报告实施反社会排斥战略以来,改善社会包容性的实际进展情况,并从2011年起,将对联邦主要机构实行年度报告制度,达到改进和完善行动计划,实现部门间、地区间经验共享的目的。

(五)小结

在印度、南非、南美洲、加拿大和美国,都有基于对社会排斥进行研究的政府机构或发展包容性社会的战略计划或行动方案。这些计划或方案,基于各自国内不同的国情,锁定了干预社会排斥的重点领域和目标,印度的种姓问题、南非的种族隔离、加拿大和美国的移民问题、南美洲的贫富分化问题等等,这说明,以社会排斥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社会关系解体,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发展问题。

综观世界各国社会管理战略的实践和经验,可以发现,以反社会排斥、发展社会包容性为核心目标的社会管理模式,在理解和解决问题时,是沿着“贫困—社会排斥—反社会排斥—消除贫困”这样一条路径展开的。这说明,今天人类面临的不是财富和福利多少的问题,而是如何分配的问题,是如何确立对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的信念的问题。“差异”、“排斥”、“不一致”等概念成为解释这些问题的关键词。尽管各国对这些问题的界定不同,应对的具体策略各异,但基本框架有许多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当技术带动社会物质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引起了人类社会生活组织形式的深层改变,这种变化促使人类发展新的思维方式和观念,重新设计和建设新的社会功能,寻找新的社会整合机制和联结纽带,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实现平衡运行的需要。在丰富的物质生活中,重新寻找人类共同体的意义,并在新的共同体的框架下,重新建立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群体与群体、群体与社会的关系,在其中诠释新的“人类美好家园”的意义。我们从上述各国关于反社会排斥、消除贫困和不平等、发展社会包容性等不同模式的社会管理战略或建设计划中,可以推论和归纳出一些一致的内涵:团结与信任、公平与正义、理解与认同、利他与利己,并不是简单的向传统的回归,而是人类社会生活组织过程具有普遍性的基本原则,是符合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因此,这些经验与启迪是值得重视的。

五、当前中国社会管理改革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分析

社会的变化往往是引起社会管理改革的动力。管理大师德鲁克(2003)用“新社会”来指称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并描述了其特征:现代企业作为社会的新的整合性组织的出现;“知识工作者”和“知识社会”的出现;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出现,以及随后“创业社会”的出现;“巨型国家”的成功与失败;因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和人口出生率的急剧下降而带来的人口统计学上的转变;信息与金钱的全球化等等。由此引发了各种趋势、各种挑战和机遇以及各种起作用的力量变化。^{[11][12-3]}这些变化属于社会结构的质性变迁,它从深层次上改变了以往的社会性质,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这些变化需要人类转变已经适应了的价值观,重塑社会信念,再造社会功能,以建立适应“新社会”的联结纽带和社会秩序,为人类提供一个具有适当信任度和安全感的社会生活环境。这就是“新社会”的管理者们面临的挑战和目标。

在这种大背景下,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也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德鲁克的“新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已经在中国现实社会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这表明,中国的社会管理者也需要做出必要的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内、外环境。除此之外,中国社会还表现出了一些特殊的社会形态方面的变化:(1)社会系统的外部开放程度更高,联系更加紧密,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的参照系和标杆,中国社会不过是整个世界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2)社会内部结构不协调的问题日益突出。从底层看,人口和土地的关系日趋紧张,由于人口规模巨大,人口对环境和社会资源的压力不断提升,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更加严重,更多地开发利用导致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又形成对人口健康的巨大风险;从中层看,人口结构更加多样化,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家庭规模小型化、结构简单化,社会成员贫富分化,职业界限趋于模糊,大大影响了一些职业的权威性,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之间生存条件差异不断拉大。(3)社会联结机制遭到严重破坏,信任危机导致疏离社会的社会排斥行为趋于盛行,亲社会行为大大减少,社会互动中缺少公平正义感、信任感或安全感,寻求社会归属感的风险和成本日益提高。这些变化和问题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一些值得引起社会管理者高度重视的社会现象被分离出来。

1. 社会原子化倾向

2007年初,在一次中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日本学者根据在中国田野调查的结果,描述和分析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聚居社区“社会原子化”的现象。2009年,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撰文提出中国社会的原子化问题,并认为这是社会的信任危机导致

的结果。^[12]“社会原子化不是指一般性的社会关系的疏离,而是指由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间组织(intermediate group)的解体或失缺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和道德解组、人际疏离、社会失范的社会总体性危机。一般而言社会原子化危机产生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原子化并不是说社会没有联结和零社会整合状态,而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其社会联结机制薄弱,社会整合度低下,出现国家直接面对民众的险象,而产生局部的、一定程度的社会失范。社会原子化危机的实质在于中间组织的缺失。因此,重构一个富有活力的中间社会,对于化解社会原子化的危机和潜在风险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历史地看,社会学的兴起正是对伴随西方现代社会兴起而出现社会解组运动、产生社会原子化危机这一重要事实的理论回应,并且,社会学理论在之后的发展中,始终是在与社会原子化问题的理论对话中前进的。^[13]

2. “社会墙”现象

2009年12月8日,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联合早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应当警惕“社会墙”,根据作者的观察,中国已经出现了多道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会墙”,“墙的出现和信任的解体已经在越来越多的方面阻碍着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信任是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作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旦社会群体和角色之间出现一堵堵无形的墙,信任自然解体,社会跟着解体。墙的出现和信任的解体已经在越来越多的方面阻碍着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没有信任就不会有有效的改革。没有人会否认今天的中国社会面临着无穷的问题,也没有人会否认这些问题是要通过改革而得以克服和解决的。但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使得任何改革越来越困难。政府任何一个改革举措,无论是经济改革,或是社会改革,或是教育改革,都不会引起社会的热情。随之而来的大多是猜疑、冷嘲热讽甚至抵制。^[14]此后,“社会墙”一词为中国学者、媒体言论所热捧并频繁使用。1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时事观察说:“社会墙”危害中国现代化进程,专家学者用“社会墙”指称一系列被观察到和辨析出的社会现象。^[15]

3. 社会戾气上升

2010年,“社会戾气”的概念出现在网媒上,用以表示一种社会心理状态。随后,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应约在《南方周刊》上发表多篇文章,深度分析了“社会戾气”在当前社会现实中的表现和产生的机制,认为公信力丧失是戾气产生与传导的机制,化解社会暴戾首先需要制约权力。当社会戾气加重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到不安。^[16]2011年4月19

日,孙立平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提到,观察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人们可以注意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我把它叫做“牵出现象”,首先是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行为的失范:权力的霸道和蛮横、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执法部门的腐败使得一些地方的民众有冤无处申;腐败开始成为一种民众无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认的现象;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强势利益集团在财富的掠夺上肆无忌惮,对公平正义造成的严重侵蚀导致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17]

4. 群体性突发事件激增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危机表征。2010年《中国社会蓝皮书》发布消息称,中国群体性突发事件呈多发态势,10年群体事件增加5倍。为此,国家开始建设应急管理人员培训基地,对地方官员进行应对突发事件的政策法规和技能培训。2005年中国社科院的《社会蓝皮书》指出,从1993年到2003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每年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每年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2008年从贵州瓮安、云南孟连、重庆、海南三亚一直到甘肃陇南,接连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让整个中国为之震动。“3.14”事件、“7.9”事件至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5. 贫富分化触及“红线”

2010年5月10日《经济参考报》消息称,中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记者在全国15个省区市采访了大量专家学者和基层干部群众,大家比较认同可以用白色、黑色、灰色、血色、金色5种“颜色收入”来概括当前形形色色的收入。^[18]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工保障研究所提供的资料,其他市场经济国家2006—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业工资差距,日本、英国、法国约为1.6~2倍左右,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在2.3~3倍之间。从目前的资料看,中国行业收入差距已跃居世界之首。^[19]

6. 超过50%的中产阶级和人群的80%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通过《新京报》所做的“京报调查”结果来看,认为自己处在“非常弱势”位置的占18.8%,认为自己处在“一般弱势”位置的占61.9%,整体上有八成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这个队伍不可谓不庞大,队伍的成员也不可谓不庞杂。在

广场上高喊一声谁是弱势群体?举起手来的会有这些人:党政干部、马路清洁工、公司白领、企业小老板、影视明星、蚁族、中产者……^[20]两项引发网民热议的调查:近日,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主要为高校、科研、文化机构职员)受访者达55.4%。专家称刚性的制度、公正公平的程序的缺乏是当下中国不安全感产生的源泉。^[21]网络调查显示,人群中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则高达七成。为何党政干部、公司白领等“精英阶层”都觉得自己“弱势”?这一普遍情绪的存在及其背后原因值得深入研究。

7. 道德恐慌蔓延

权力腐败导致底层生态的丛林化和整个社会生态恶化。这里所说的社会生态恶化即孙立平概括的“社会溃败”。所谓社会溃败是指社会系统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堪称社会癌症。社会溃败的重要表征首先是,由于权力失控,腐败也必然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22]影响规模越来越大、发生频率越来越高的不安全感 and 担忧,正在一浪高过一浪地引发社会成员的道德恐慌情绪,这些不安全感 and 担忧的问题充满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担忧,特别是医疗、教育、食品、药品,对商品流通的规则担心,社会大众普遍担心生产者、流通者黑了心,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把不合格的、损害人们健康的产品和不负责任、质量低下的服务强加给了消费者;(2)对职业道德担心,以往一些受人尊重的职业被标签为“黑狗(警察)、白狼(医生)、眼镜蛇(教师)”;(3)担心官场竞升和职场竞争中“明码标价”的潜规则盛行;(4)担心社会交往中的坑、蒙、拐、骗,救人怕被污告、打官司怕被法官敲诈勒索,打工怕讨不到工钱;(5)对社会流动的潜规则普遍感到担忧,担心努力和能力难获成功,腐败现象的普遍化与对官员群体的偏见,导致权、钱、色交易之下的成功归因与关于“富二代”、“官二代”的传说,让多少人“望成功兴叹”。关于这些现象的信息传播不同程度地扩大事实或偏见,但人们热衷于通过各种媒体传播这些信息,导致社会大众的道德恐慌蔓延。大量社会舆论源于“暗箱操作”,造成社会认知偏见和误解,很多人认为“这个社会乱了”,引起了普遍的道德恐慌,其后果一是使亲社会行为大大减少,二是产生了一些反社会行为,主要表现为对社会事务的淡漠和拒绝参与,自愿选择边缘化。这些社会排斥行为正在波及到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甚至中产阶级也存在许多社会排斥行为,造成社会阶层间乃至共同体的分裂。对此,必须有一个社会监测体系和社会信息公布制

度,给民众以透明和知情权。对于社会成员普遍关心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交待。这是当前消除道德恐慌的关键技术或管理手段。

综合分析发现,这些现象多数是属于社会结构的问题,表现为社会内部的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疏远、排斥、偏见甚至敌视,这些关系特征不同程度地表现于不同的阶层之间、群体之间、人际之间。从社会学原理看,这些现象(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非社会”现象)被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并描述,说明当前中国社会的分裂力量正在上升,社会整体的运行不太正常,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组织得不是很好,迫切需要重建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从近些年来中国社会管理的实践看,实现这种目标的意义已经被国家政治层面认识到并成为一种强烈的政治愿望,从小康社会到和谐社会到包容性社会的提出,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愿望在政治层面的不同表述。最高权力层一直试图从政治的角度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社会秩序的重建,必须按照社会的原理和规律,政治原理不能代替社会原理,政治理想或愿望不能代替社会形态及其功能;否则的话,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没有可能解决社会原子化的问题,包容性社会也不可能实现重建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的理想。

国家层面的社会管理乃是一个执政行为的选择,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从行政命令,到绩效管理,到公共服务,到社会治理等一系列的模式转换,培育和建构了今天中国的现实社会结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提出前,认为中国社会的问题是改变贫穷落后,富裕将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当中国社会日益变得富裕起来的时候,社会仍然问题重重,社会成员的主观感受、学者的理论诠释、外界的观察与评论,都无一例外地表明,富裕起来的中国,没有建成一个更加“幸福的社会”,甚至没有能够给绝大多数成员提供一种更加优质的生活质量。无论是结构的变化还是功能的演变,都难以从社会普遍原理和运行规律中得到解释,即:不是正常的社会分工和人口集聚造成的正常的社会结构增生,而是由于社会资源分配的结果造成的阶层分化,是在制度不健全的背景下,由于市场竞争造成的弱势群体的边缘化,是富裕阶层远离生活于其中的社区的自我封闭。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提出以后,一些官员们怕担责任、影响政绩,曲解了和谐社会的内涵,片面强调社会的稳定和不出乱子,掩盖、瞒报局部的矛盾和纠纷,在是非面前采取“和稀泥”的态度,回避矛盾甚至用金钱政治代替行政责任,是非、真假、善恶、美丑都被扭曲地“和谐”掉了,信用、责任、良知,这些人类社会存在的精神基础,逐渐丧失,公共领域突发事件频发,社会成员个人的满意度降低,社会归属和安全

的需要普遍没有着落。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社会管理实践过程中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1)把社会看作是与政府、市场相对照的现象,其误区在于将社会只放在中观的层面上来看待,而忽略了社会的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客观存在,以及社会实体的整体性。从政治管理到企业化管理,到公共管理,到公共服务,到提出社会治理,到和谐社会建设,所强调和突出的主要是效率和法制,公平和正义的社会组织原则被淡化了。(2)没有按照社会自身运行的规律和原理制定并实施社会管理。人口集结成社会是有其特殊的需要和本质特征的,社会既不同于企业,也不同于契约关系,社会组结或联结是有其特殊的规律和原理的,众多的人口生活在一定的空间的时候,对于社会性的需求就上升为第一需要。人口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决定了人口结成社会既是满足其生物性的需要,也是满足其社会性的需要,既牵涉到资源的问题、空间以及人口分布形态等物质要素,也关系到体现人口社会性所必需的思维、情感、意愿、迁移等精神要素。(3)没有明确管理的目标和对象问题。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应当是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社会成员的共同感,而作为社会实体的各类社会组织、共同体则是被管理的对象。但是,在中国现行的社会管理战略中,只强调了体制改革和建设的重要性,没有明确指出社会管理的具体目标和对象;强调了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忽略了社会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要求。

这表明,当前中国社会管理所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社会结构的调整,目标是重建社会信念,健全社会有机团结的纽带,重塑社会形态。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的实质,就是运用管理的手段,重建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消除或减少社会戾气,降低社会原子化程度,增强社会团结。强调社会管理不能只强调管理主体的问题,也不能只从分权的问题上强调管理机制问题,而应当从社会形成的原理出发,寻找形成社会联结或增强社会团结的机制:(1)倡导和构建包括社会信任、社会信念、社会价值在内的社会诚信体系,建立有利于形成这一体系的处罚、奖励和强化机制,减少引起道德恐慌和社会排斥行为的心理因素;(2)建立利用社会组织赋予社会成员多重身份和功能的机制,减少“社会墙”的形成和隔离,化解社会戾气,让社会成员可以通过不止一个的社会组织来实现自己的社会性,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充分提供给人们表现亲社会行为的场所和机会,增加人们的亲社会行为,减少人们对社会的疏远;(3)制定并实施旨在减小社会阶层差距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对公共部门的资源分配过程进行有效监督,

减少制度性的社会排斥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分裂力量;(4)建立针对社会成员普遍关心的社会资源分配结果的监测评估与信息通报制度,增强社会生活的透明度,减少社会认知偏见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排斥;(5)重视社会管理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建立社会监测评估信息分析和研究制度,以及保证研究有效性的投入和保障制度,提高社会管理的计划性和目的性。

参考文献:

- [1]莫里斯·哈布瓦赫.社会形态学[M].王迪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
- [2][6][11][美]彼得·德鲁克.社会的管理[M].徐大建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10;7;2-3.
- [3]包晓霞.社会学关于现代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理论[J].甘肃社会科学,2010,(5).
- [4]詹姆斯·汉斯林.社会学入门——一种现实的分析方法(第7版)[M].林聚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18.
- [5][美]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M].顾建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16-20.
- [7]Grace-Edward Galabuzi (2007) Social Exclusion, Race and Immigration as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McGill Institute of Social and Health Policy, October 25 2007. Sukhadeo Thorat, Caste, Social Exclusion and Poverty Linkages Concept, Measurement. S Thorat - Concept Paper for PACS, New Delhi, October, 2005 - empowerpoor.org; Chiara Saraceno (2001) Aadne Aasland and Tone Fl?tten: Ethnicity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Estonia and Latvia,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3, No. 7 (Nov., 2001), pp. 1023-

1049 Glenn C. Loury Social Exclusion and Ethnic Groups: The Challenge to Economics Glenn C. Loury Boston Universit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April 28-30, 1999.

[8]Rosanna Scutella, Roger Wilkins, Michael Horn, Measuring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Australia: A Proposed Multidimensional Framework for Identifying Socio-Economic Disadvantage. Melbourne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4/09, March 2009.

[9]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ty Charter of the Fundamental Social Rights of Workers, COM (1989)471.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Quoted in David G. Mayers, Jos Berghman and Robert Salais. Social Exclusion and European Polic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1.p28.

[10]Quoted in Brain Lund, Understanding State Welfare: Social Justice or Social Exclus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2, p.192. Brain Lund, Understanding State Welfare: Social Justice or Social Exclus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2, pp.192-199.

[12][14]郑永年.中国要警惕高度不信任砌成的“社会墙”[N].羊城晚报来源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12-09.

[13]田毅鹏,吕方.社会原子化 理论谱系及其问题表达[J].天津社会科学,2010,(5).

[15]http://www.jfdaily.com/a/840022.htm.

[16][22]郭于华.南方周刊[J].2010,(32).

[17]孙立平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中国当务之急是制约权力和资本[N].南方日报,2011-04-19.

[18]经济参考报,2010-05-10.

[19]中国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红线”[N].经济参考报,2010-05-11.

[20]新京报,http://www.sina.com.cn,2010-12-11.

[21]西安晚报,2010-12-05.

(编辑:刘晖霞)

empirical evidences for the unavailable risk are given and the feasibility of classification for the unavailable risk is discussed.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written emergency response plans which focus on the attention or attempt these plans give to the unavailable risk, some recommendations on systematic identifying and mitigating this risk are given to update the current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to guild the corresponding emergency preparation.

Key words: Emergency planning; Emergency preparation;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Unavailability of service; Risk

(6)

Analysis of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Mechanisms on Livelihood Development in After-the-unit Society

—— Liaoning Province as a Study Case in Shantytowns Rebuilding

Ni Wei Zheng Rong Zhao Dingdo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History 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Anshan 114005 ;

School of Economic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shantytowns rebuilding as the main form of livelihood development is a manifestation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in After-the-unit society, constitutes a study of livelihood projects, "meaning China." In unit society it is need countries to provide duties of protection because that government's long-term high controlling in social space, people's psychological relying on unit, state controlling of resources alone as so on. Relative to the unit society, After-the-unit society at least have three characteristics First, the operating rules of the market economy has become the coordinating mechanism of social relations, the utilitarian principle has been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base of coordination in personal interest Second, the people of unit is to increase social rationality, utilitarian in network of personal interests also changes the social basis of unit social Third, with the gradual digestion of the unit system, there is another social life quite different from unit society is nurtured, that is , society or community as the main Field has coming.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is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way of social life and the developmental logic, and Group revenue effect is playing a role in management of public affairs and squatters' maintenance of self-interest. However, in the real sense of squatters on the bottom of the social status, utilitarian of individual and social network building is the community foundation of social protection which people looking for interests in After-the-unit society. After-the-unit society is a direct consequence of market transformation which directly lead to logic transform. in Chines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s to the state-led social resources ,In Shantytowns rebuilding, it actually consists of four aspects, the protection of state power, ability, effort and stimulants. The mechanism itself from the sense of shantytowns, reflects the return of the country,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Key words: Bottom of Position; After-the-unit society; State responsibility; Shantytowns rebuilding ; Social construction; The system of umt

(7)

The social Inclusion Founding on the Social Solidarity

Some Current Issues Concerning Social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a

Bao Xiaoxia

(Gans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Creation of a new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construction of a more inclusive society, is the core issue of the current reform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of China . This article interpreted the target selection of current

social management of China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challenges in front of the reformation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In the view of social morphology, the society is a physical psychological process that includes a physical part, referring to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which is formed by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resource and, and a psychological part indicating the bridge of social connection. Therefore, the social management is defined as the process of the social manager to controlling the mobility of population and the mind-set of social members, strengthening the bridge of social connection and to continuously mold the changing social formation via adjusting the supply and distribu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this process, sociology prepares us with systematical theories and analytical tools while our profession abroad provides the referential experience on strateg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management.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states clearly that the current China is in the need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inclusion on the basis of strengthening social solidarity.

Key words: Social management; Social solidarity; Social exclusion; Social inclusion

(8)

Developing Trace, Academic Contribution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the Rural Governance Study: by Studying CSSCI Papers

Wang Ximi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58, China)

Abstract: Rural Governance Stud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ral research, also an important area of concern of political science, sociology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s, its research can be described as voluminous. The "village self-government", "rural governance" as key words (exact) 1998-2009 CSSCI database searches about 840 pap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history to study the 840 papers by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we found the village governance system of village autonomy from the field study has been extended to the management of integrated rural political and social village, research perspective has been from country to the village combined with the state; the main academic contribution of village governance is to create a group of localization concepts to explain Chinese rural societ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impetus of village governance research lead "local group" and promote academic contentio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Village Governance research shows to create academic community, promote the academic debate, pay attention to China's problem is beneficial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sciences.

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 study; Village self-government; Rural governance; The central China school of rural studies ;Academic history

(9)

Criticism of the Average Allocation Mechanism and the "the Criticism"

He Xiangzhou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internal criticism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which Chinese society made for the accounting unit of the average distribution reflects the very good results. Due to the field that the existence of this concept to be sure is not correct, combined with the old average distribution barrier devel-